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翻译研究论丛

孙艺风 著

文化翻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翻译研究论丛

孙艺风 著

文化翻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翻译 / 孙艺风著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0
(翻译研究论丛)
ISBN 978-7-301-27937-3

I . ①文… II . ①孙… III . ①翻译 - 研究 IV . ①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2625 号

书 名	文化翻译 WENHUA FANYI
著作责任者	孙艺风 著
责任编辑	郝妮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937-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bdhnn2011@ 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14.25 印张 260 千字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绪 论

在全球化和跨文化的语境下,翻译与文化传播的相关性更为显著,随着翻译研究的所谓文化转向得到重视,“文化翻译”的概念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文化翻译是源自文化研究的一个概念,指在特定文化内进行的语言或其他方面的改造。由于文化的构建作用日显突出,文化形态的各种存在、变迁及改造方式,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研究的重要方面。翻译对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过程中,文化翻译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其沟通不同文化脉络,增强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和尊重的作用不容忽视;由此而体现的多元之美代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随着多元文化的崛起,我们有理由期待世界多元之美的前景。

本书以全球化的视角审视翻译学的发展动向与趋势,从中西文化差异性的角度来观察各种翻译现象,在理论的层面澄清异质他者的性质,重点关注翻译的文化属性,从不同的角度和多个方面探索和讨论有关翻译的诸多复杂问题,并在不同的层面论证文化翻译的可操作性。自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以来,文化和翻译的关系就变得愈加难以分割了。如今,文化翻译俨然又成了一个热门概念,具有强烈的跨学科色彩,不同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都在使用。然而,过于宽泛地使用这一概念也引起了诸多混乱、迷茫及对翻译研究本体身份的担忧。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趋势,使得文化的不可译更具挑战性,但也促使了更为丰富的多样化和多元性,这不仅极大地拓展了跨文化交流空间,同时也唤起了对文化差异与沟通更多的关注。本书系统地 from 多个角度分析影响文化翻译的各种主要因素,全面梳理文化翻译的发展过程,强调指出译学界以“转向”为特征的盲目跟风“乱象”,并着眼于解析文化翻译所引起的困惑,进一步再提出整合不同有关概念的途径与策略,旨在提升其对与文化相关的众多翻译现象的解释力。

这是一个日趋全球化的世界,本土化力量在跨文化交际的全球语境下,使得人们对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关键性角色的看法产生了范式性的转变。翻译活动催生了全球化的商业文化,同时也支配着翻译方式的运作。全球化

商业文化的出现又触发隐忧：文化间接触的增多可引致文化殖民，并进而形成一个威胁本土文化生存的同质化世界。因此，为应对全球化而（重新）建立本土文化地域和文化身份的极端重要性毋庸置疑。同时，经由翻译，一种业已普遍化和正处于普遍化进程中的文化语言，正唤醒并强化对本土文化的身份认知。翻译活动乃本土现实的组成部分，而本土现实与跨族文化为标志的全球化浪潮密切相关。有鉴于此，文化翻译成功与否取决于本土知识，而后再通过协商的办法，产生出目标语读者可接受的并具有本土色彩的文化话语。

翻译这门学科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集大成者，涉及面不可谓不广，包括历史环境、文化语境、符号意义、政治宗教、美学体验、意识形态、多元杂合、性别意识、社会功能等等。翻译是人类交际不可或缺的方式，也就决定了其核心特性是跨文化的。文化间的交流又是至关重要的，起到的是缔结不同文明体之间对话的纽带作用，丰富了人们的知识和情感生活。总体而言，纵观翻译的作用和功能，翻译的文化属性是毋庸置疑的。翻译不可能绕开文化差异，各种国度和地域的文化各不相同乃至千差万别，作为跨语言交际的翻译活动，势必要面对和处理无数独特和风格迥异的文化特点。因此文化差异不容小觑，因其后面是思维方式的差异，体现在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全球化与本土化，历史文本与现实表现，文化价值与接受审美的冲突和差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交流、沟通、理解、尊重无一不涉及跨文化态度，而角逐、冲突、争斗也是不同文化碰撞的必然结果，所以翻译必须正视文化差异并关注各种文化的个体性和独特性，进而从事有效的协调和沟通，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途径，对于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战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翻译的文化纬度的重要性显得日益突出。跨文化语境下的翻译活动受制于各种因素，不可不应对（不）可译性与跨文化阅读，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障碍估计严重不足，中译外，尤其是中译英的效果，一直有些差强人意。翻译首先要解决文化跨越的问题。文化层面的不可译性，显然是我们交际的最大障碍。不可译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跨文化的不可读性，或低可读性。译作的接受势必涉及跨文化交际的可读性，如可读性低下，文学翻译的艺术价值则难以体现。故此，跨越不同文化的栅栏，超越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就得制订有效的跨文化交际策略，探讨不同民族文学间的审美共性，以期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翻译必然是一种杂合的产物,把各种不协调的东西糅合进异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混合物中。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不可通约性,其特征为各种影响稳定的效果,既确立又破坏了文化身份。在各种程度的开放中,文化优越感或自卑感决定了如何形成和重新形成规范的翻译策略。文化等同只是一种幻想,尽管在政治上是正确的。然而,现代翻译研究强调多样性、杂合性、流动与变化,并涉及翻译行为、不确定性、互文性、主体性、经纪人和经典化。由于翻译在一个具有不同文化的意义系统里运作以及阅读受到文化制约和寓意,翻译中出现了复杂的文化移入模式,极易生变却又持续不懈。因此,结合翻译和身份、杂合和嬗变等棘手问题来研究文化移入的过程成为必然。文化杂合源于对文化制约和限制的克服,并且试图通过调解、挪用来和解或者操纵跨文化差异。在跨文化参数方面,翻译意味着不断的调整和换置。其结果是:翻译研究的身份也必然是不断变动的。这也是基于跨文化和跨学科的重要性——或者不可避免性——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承认。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翻译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对异质他者的文化焦虑和矛盾心理,在构成翻译基础的文化政治中,异质他者性在本质上被具体化。尽管说意识形态无处不在有些言过其实,但它显示出一种主要跟语言和艺术息息相关的倾向,并且对翻译的需要同目标语言系统的政治或文化关注密不可分。差异的文化政治跟坦言、真诚、可理解性和移情有很大关系。翻译的有效性不仅仅来自对所译信息内容的合理解读,还取决于目标语读者的能力,在于他们通过获取对异质他者在其文化政治语境中的必要了解,而将该信息同相关文化情境联系起来的能力。技巧上或者说人为的等同需要拒绝和简化原义,然而强制文化输入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一种入侵;常以意识形态冠之的文学和翻译的争论,往往围绕异质他者的建构力和破坏力来进行。尽管有时与主流政治环境相悖,翻译仍然可以接受和引入异质的政治和民族价值观。

很明显,为避免因缺少调解而导致的无效翻译,必然要在一个不同的语言文化语境中,产生出可理解和阐释的译文;即言之,原本有限的符号需要经过处理,而不仅仅是所谓的平行转移,因为符号经常同特有的习俗相关,而习俗是不能不顾及语言文化差异而强行跨越文化疆界迁入另一文化中的。必须考虑到的一个不稳定、本身也是破坏稳定的因素,可解读性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的条件在目标语中也存在差别,因此,在源文本中理所当然的理解在翻

译后便成了问题。阅读的基础可能是阐释,也可能不是,如果我们接受海德格尔(Heidegger)的观点,即阐释是明晰化了的,理解,就意味着隐性的理解也可能无须求助于阐释。确实,如卡曼(Carman)所论,“……我们的理解大都是隐性的和无主题的。”^①最容易产生的顾虑是由差异导致理解困难的可能性,并且如果翻译不能达到语义合法化,那么这种翻译毫无疑问不具有可接受性。因此严格来说,可理解性的构造不可简化,这实质上表示差异不可简化,因为差异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差异性必须得到承认和接受。翻译是理解的临时途径,通常会被用来降低语义的不确定和易变的特性。尽管存在显性和隐性两种理解交替作用,翻译更趋向于不同程度的语义明晰化。

既然没必要强求文化等同或一致,翻译就不可能避开异质他者性,因而必须涉及对它的理解、阐释和感知。此外,由于其可预知性,等同是枯燥乏味的,而与之相反,他者相对来说是未知的,因而令人兴奋。由于阅读的陌生化体验,他者性很可能会产生强大的冲击力。因此与他者的接触,尽管表面上看起来相当危险,却是一种几乎无法避免的巨大诱惑。然而,既然异质他者的旅程好像不可能那么一帆风顺,它很有可能导致不同种类和程度的误解;而这种误解或许有重大的文化政治含义。可以确信的是,我们不能预设或者引证意义的等同,并且由于很多其他方面的区别,比如形式或政治的差异,语义的等同预设,在翻译中显得可疑,因此后者应该避免冒预设意义等同的风险。事实是,在异质他者中理应能找到现代性、合理性、普遍性所有这些可取的成分。因此,同中寻异、异中觅同,也就变得颇有意义了。在原文和译文之间小心翼翼地建立起来相似性和可通约性的表层后面,与他者相关的、由不同文化政治价值观的差异所产生的张力,使得所有不同的创作形式成为必然,从而超越禁忌的束缚。随之而产生的文化政治碎片也很可能找到进入翻译的途径,并通过翻译影响目标语言系统的思维。

由于全球化的影响,我们目前处在一个全新的文化语境下,越来越多的国人有机会出国留学、工作、旅游。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加之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人们有了更多的文化离散经历。这种悄然发生的变化已经并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化态度,以及对翻译的认识和期待。中国或许缺乏翻

^① Taylor Carman, *Heidegger's Analytic: Interpretation, Discourse, and Authenticity in Being and Ti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1-22.

译批评的传统——大概是因为缺乏学术批评的传统所致——但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翻译批评的平台。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愈来愈多的人通晓英语,有海外经历的人也不断增多。所以,尤其是源语为英语的情况下,翻译活动已不是少数翻译家所能主宰的了。不少目标语读者具有在英语国家生活过的离散经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直接体验,使得他们有了“纠错”的资本和冲动,同时也体现了文化责任感。目标语读者结构的这种看似细微的变化,导致了译作质量的提高,必将对我们的翻译活动及行为产生长远和深刻的影响,并利于塑造我们应有的文化心态。

翻译态度因不同文化传统而异,有关翻译的运作流程,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基本假定,其广泛和持续的影响,不容忽视。翻译中立是一种带乌托邦性质的预设,掩盖和遮蔽了政治争拗与文化冲突。复杂的情感、态度、情绪和性格,常与目标语的文化政治和美学规范纠缠不清,故此,有意或无意地违背翻译中立的行为,并不足为奇。同时,也不难看出一味追求或固守中立的负面影响:可能引致漠不关心或冷漠超然的情况。译者干预是翻译态度所折射出的文化差异使然,虽较容易被政治化,但为了完成跨文化交际的任务,却又是不可或缺的。干预决定了文化挪用的性质及方式,与是否有情感的投入以及何种程度的投入,有着直接的关系。就翻译的对象而言,除了基本信息外,源语里的感情或情感也需要传递,并在译作里得到较为清晰和充分的体现,使目标语读者有参与跨文化体验的机会。由翻译而生的位移可能造成异位,乃至错位,故此,翻译在调整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移情。因而有必要提出一个探索翻译态度的方式,进而分析细致入微的感情或情感的传递(达),考察其对译作的产生和形成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翻译态度和干预方式及其程度,体现和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并揭示出不同译作所循的差异性途径。

同时,我们还需要指出和认清翻译的暴力性质。翻译与暴力似乎有不解之缘,暴力产生的不同诱因和具有的各种形式值得探索一番。表面上,暴力似乎是由不可译引致的——无奈的解决之道。在多元文化的社会里,暴力的文化内涵与人们对翻译性质的认识息息相关。本书的目的之一,是探索和阐述暴力是如何根深蒂固地影响翻译行为的。由于翻译易受源语与目标语之间权利关系变化的影响,某种形式和程度的暴力行为必然会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翻译暴力的不可避免不难认识,但重要的是了解和把握其类别和性质,这对我们认识翻译的本质和规律,不无裨益。

在我们当下所处的全球化时代,在协商国家与文化空间的过程中,要求对距离进行重新定义。世界在日益缩小,时空距离也随之产生变化,但在文化翻译的语境里,更为深刻的变化是形式、认知、情感和理解等诸方面的距离。局部细节变得愈加不容忽视,虽看似微不足道,但因直接关乎跨文化阅读体验,可对译作的接受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为了适应条件和环境的变化,翻译游离于不同的距离之间,在充满动态的空间里复制或制造文化意义。距离也是由差异引致,既是不可译的缘故,也是克服不可译的手段。因此有必要在认知和实践的层面上,探求距离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运作的。距离和位移息息相关,作者和原作读者的距离与译作读者的距离在性质上可能迥然不同。距离常由错位引致,故易产生疏离感,需要不断加以调整。

翻译的移情性质亦不容忽视。翻译引起的语境转移以及随之而生的各种符指形式,会使目标语读者阐释文本的方法受到质疑。语境换置不仅在语言和文化上束缚翻译,而且为文化他者性敞开大门,使阐释和操纵成为可能。改写必然成为翻译的基础,需要某种形式上的创作和干预介入。除非直译在交际过程中是切实可行的,否则改写就会彰显出各种形式的介入,以应对由于语言和文化移位而导致的译文中的不连贯性。事实上,由于跨文化翻译中不可译性的存在,文学文本中相当大部分都未经译出或者未得到充分翻译。由此,一种新型的主体性崭露头角,尝试在忠实与自由间取得平衡,以达到两者的互补互利。因此在他者性建构过程中,一场持久的角力在本真与改造之间展开。译者不断获得授权,集中体现在决定是否介入或者如何介入目标文本,以创造一种“异域的”或本土化的阅读体验。随着跨文化意识的不断增强,研究翻译如何挑战固有文化价值以及如何转变固有文化传统势在必行。

翻译学在摆脱了对应用语言学依附的桎梏之后,获得了较为广阔的学术(科)发展空间,以突破学科限制为标志的文化转向又为译学研究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翻译学在20个世纪90年代经历了学科大发展并奠定了学科身份之后,一直以跨学科探索为研究特色,注重多元文化互补、不同学科彼此交融,逐步形成了开放性、多角度、多层次的特点。与此同时,寻求学科新突破的各种尝试使译学研究产生了此起彼伏的转向,以致对翻译本体的“偏离”似乎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由此而来的问题是,译学研究在经过了若干范式转换后,似乎又面临学科身份合法性的挑战。如何在扩展学科领域时突出学科本体,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属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被借鉴到译

学研究领域后,其相互促进的空间又有多大,需要深入思考。历久弥新的翻译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影响力取决于能否夯实持续创新的基础。

总之,翻译需要直面各种各样的差异,文化的、语言的、风格的、政治的、社会的等诸多面的差异,但首当其冲的仍然是文化差异。文化翻译的任务是把不同类别、不同性质的差异整合在一起。翻译毕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文化的多重维度在这一复杂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文化的不可译性是翻译最大的挑战。翻译所涉及的不同文化底蕴,以及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构成了文化的差异性。我们为差异着迷陶醉,也为差异困惑不安,处于既吸引又排斥的矛盾心理,不免产生深刻的文化心理纠结。面对异质他者,渴望与期待似乎与文化焦虑相伴。然而,这些都是跨文化交流的正常现象。重要的是建立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吸收和消融外来文化,以丰富和发展本土文化,同时弥补或克服我们自身文化的缺失与不足。有了积极的心态和开阔的心胸,才能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文化翻译与翻译文化	1
引 言	1
第一节 并非“转向”	1
第二节 学科身份	6
第三节 跨文化范式	10
第四节 文化改造	13
第五节 文化可译性	17
结 语	22
第二章 文化翻译与全球本土化	23
引 言	23
第一节 全球化趋势与翻译	23
第二节 全球语境下的本土文化	26
第三节 本土知识与可达性	29
第四节 翻译的本土化	32
第五节 文化意义与全球本土化	36
结 语	40
第三章 翻译与多元之美	41
引 言	41
第一节 文化翻译	41
第二节 文化阐释	46
第三节 文化语境	50
第四节 文化形式	53

结 语	57
第四章 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策略	59
引 言	59
第一节 谁来翻译中国	59
第二节 本真性与可读性	62
第三节 翻译的变通之道	65
第四节 文化移位与改写	68
第五节 不可译而译之	70
第六节 译文的接受	73
结 语	75
第五章 翻译研究与文化身份	77
引 言	77
第一节 翻译研究学科身份	78
第二节 翻译的政治路线图	81
第三节 翻译的构建	84
第四节 翻译角色的重新定义	88
结 语	90
第六章 翻译与异质他者的文化焦虑	91
引 言	91
第一节 他者引发的焦虑	92
第二节 他者性无处不在	94
第三节 同中有异	97
第四节 自我与他者的对话	100
结 语	103
第七章 翻译与文化的离散性	104
引 言	104
第一节 翻译的可达性	104

第二节	异己视角的转换	108
第三节	文化变形及身份嬗变	111
第四节	文化放逐体验	115
第五节	跨文化对话模式	118
结 语		121
第八章	文化翻译与情感态度	122
引 言		122
第一节	翻译态度	123
第二节	情感体验	127
第三节	情感反应	130
第四节	修辞再现	133
结 语		136
第九章	翻译的暴力属性	138
引 言		138
第一节	暴力类型	140
第二节	暴力性质	142
第三节	激进改写	146
第四节	文化疏离	149
第五节	文化改写	151
结 语		155
第十章	翻译的距离	157
引 言		157
第一节	文本距离	158
第二节	时间距离	161
第三节	身份距离	163
第四节	文化距离	166
第五节	审美距离	168
第六节	操控距离	171

结 语	173
第十一章 翻译与文本的再创作	175
引 言	175
第一节 跨文化互文性	175
第二节 移位与文化介入	178
第三节 创造性改写	181
第四节 跨越文化疆界	185
结 语	187
第十二章 翻译学的何去何从	189
引 言	189
第一节 翻译的定义	189
第二节 文化操纵与改写	193
第三节 跨学科与学科身份	195
第四节 学科蜕变与转型	199
结 语	202
跋 语	203
索 引	207

第一章 文化翻译与翻译文化

引 言

文化翻译这一术语大家都在用,许多人都“染指”了文化翻译的概念,但翻译学者和其他领域的学者的具体用法大相径庭,而在实际用法中又混为一谈。人们一般就文化翻译的含义都抱有一些基本设想,往往较为含糊空泛。文化因有过多的定义,且莫衷一是,反而愈加模糊了。文化翻译一直以来都是关键性的概念工具,用来理解在一系列宽泛语境下的混合效果:从殖民主义到多元文化,一直到现代性,并频繁出现在众多学科领域里。

凡是具有文化接触和协商性质的翻译行为,都可在宽泛的意义上,称为文化翻译。其中的核心是各个方面及层面的协商及融合,并充分尊重文化差异。文化差异的传递是跨文化交流不可忽略的因素。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除了持有一个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态度,还需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直面文化翻译的各种难题,探索出有效的破解之道,不断探索文化的可译性。文化形式或形态的翻译,一直是不容忽略的挑战,文化心理及无意识的相关心理状态影响和左右翻译的策略的选择和制订。

第一节 并非“转向”

文化从来就是翻译的组成部分,文化意义几乎不是固化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经历的人,对意义的解读、体验及重构也不同。共同经历和体验的缺失,使得文化层面的翻译困难重重。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翻译,一度诱发了对翻译本体的担忧,但也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因素在翻译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认识。主要关注的对象是过程而非结果。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伴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这一术语在巴斯内特(Bassnett)和勒菲弗尔(Lefevere)《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的

“介绍部分”里首次使用。问题是:真的是转向吗?何时转的?具体以什么为标志?似乎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关于转向的时间,有人说80年代,也有人说90年代。原本翻译学在80年代已有了“文化转向”,继而“文化翻译”在90年代又盛行了起来,主要由后殖民理论牵引和诱发。翻译学的研究滞后,表现在其“后知后觉”,90年代初振臂一呼的“文化转向”,如果说是翻译研究大幅度的转向,不如说是对80年代翻译研究的总结,更不如说是更早期对翻译文化关注的延续与发展。“文化转向”无非是更鲜明指出研究者把关注的焦点或重点从语言层面转到了文化层面。

自“文化转向”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转向,产生了恶劣的跟风效应。有时这厢刚转完,据说那边又要转了,弄得大家晕头转向。所谓转向意味着改变方向,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无非是跨学科尝试的表象。好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兴奋点又转移了。如此浮躁,浅尝辄止,长此以往,学科的发展前景堪忧。好在经过了多次转向之后,人们终于清醒了一些,不再像以前那样动辄开口就提转向了,大抵是对不断转向产生了厌倦感。其实,研究倾向侧重于某方面的问题的关注与探索,未必就一定要大惊小怪地称之为“转向”。翻译研究的碎片化让人担忧,如果一个学科不间断地转来转去,而且仍有不休止的架势,那碎片化只能进一步加剧。

说“文化转向”并不准确。如阿尔伯特·布兰奇戴尔(Albert Branchadell)所指出,早在1954年,卡萨格兰德(Casagrande)就宣称:“翻译不是翻译语言,而是翻译文化。”^①实际上,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早已联系在一起。鲍里斯·布登(Boris Buden)和斯蒂芬·诺沃特尼(Stefan Nowotny)将文化翻译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当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等人在19世纪就要求译者忠实于原文的“异质”(Das Fremde)。^②此处的“异质”指的就是域外的文化。所以他们的结论是:对洪堡特而言,“翻译一直已经是

^① Albert Branchadell, “Introduction”, In Albert Branchadell & Lovell Margaret West (eds.), *Less Translated Language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05, p. 6.

^② Buden, Boris and Nowotny, Stefan. “Cultural Transl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 *Translation Studies*, Vol. 2, No. 2, 2009, p. 199.

文化翻译。”^①目的是为了促进德意志民族的自新自强,德国的语言与文化能得以汲取外来文化的养料,有利于建立自己的民族精神。翻译的主要目的就是借助外来文化丰富和发展本土文化,关注的重心势必是文化层面的内容。

文化翻译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两个分支。在20世纪50年代,在一个特定意义上作为隐喻与英国人类学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主要关注的对象是文化的翻译,并以此来确定跨文化交际的感知效度。译者不仅需要具备文本知识,还要有语境知识。首当其冲的问题在于文化差异,不容回避或试图减少,不仅需正视处理,还需欣然接受并对其前景化。就人类学的表述而言,准确度是至关重要的,文化翻译的目的是要反映出不同的思维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同的思维模式导致不同的表达形式。简言之,这种类型的文化翻译关注的重点是差异性,而不是相似性。文化人类学一直依赖于翻译作为文本实践,经常用“翻译”作为比喻来形容人种学解释和跨文化比较的过程。

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文化翻译不是常规的翻译概念,即涉及源语或目标语文本的概念。他所指的翻译过程,也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具体翻译操作过程。从不同的来源或源语文本的“翻译”所具备的兼收并蓄的本质,是文化翻译的一个关键性的部分。在一个较广泛的意义上,如威尔·S.哈桑(Wail S. Hassan)所指出的,任何双语作家“介绍了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必然是一个文化译者。如果作家懂两种语言,文化翻译就是一个双向的活动,因为他/她把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做解释。”^②由于译者面对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读者,他们需要协商不同的文化条款,以使不同及多元的文化体验可以被理解和分享。巴巴在谈文化翻译时多少有些含混,是以隐喻的方式谈的。尽管文化翻译的概念有上述两个分支,从事翻译研究的人大可不必“选边站”。文化翻译的这两个维度未必相互排斥,而无法打通与整合。

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与本雅明(Benjamin)所代表的译学传统是不可能与当代翻译理论割裂的,他们的不少洞见对于当今的研究仍有巨大的启迪意义和现实作用。二人在谈论翻译问题时,也一直给文化以持续的关

① Buden, Boris & Nowotny, Stefan. "Cultural Transl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 *Translation Studies*, Vol. 2, No. 2, 2009, p. 199.

② Wail S. Hassan, *Immigrant Narratives: Orientalism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Arab American and Arab British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63.